



三件红色文物的故事

□ 于 轩

于都，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见证了当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苏区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红军就是从这里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如今，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羊皮袄、藤篮、行军锅……这里陈列的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

一件厚重的羊皮袄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件厚重而破旧的羊皮袄，军绿色的棉布内是厚厚的羊毛，胸前一排整齐的扣子……羊皮袄的主人于都籍老红军曾广华，正是这件不寻常的羊皮袄，陪着他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枪林弹雨。

曾广华是于都县银坑镇磊琶村人。1932年，28岁的他在于都县“扩红”征兵中踊跃报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他先是被分到游击队担任班长，后来分到红一方面军23师担任通讯员。在一次战斗中，由于表现出色，上级奖励他一件羊皮袄。他将这件羊皮袄当作自己的功勋，十分珍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从于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曾广华也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此时，曾广华是炊事班的一名战士，负责部队的饮食。1935年6月，部队到达四川省境内的夹金山下，曾广华在附近的乡镇采买粮食，当地的一位老人得知他们要翻越夹金山，便叮嘱：“夹金山是座雪山，越往上越寒冷刺骨。翻山一定要多带衣服，在山上绝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再累再冷也不能停下来……”

时值夏季，不少战士在行军途中将衣服送给了穷苦的老乡。曾广华也送出不少衣服，唯独这件羊皮袄，他一直舍不得送出去。

“过雪山时，这件羊皮袄救了我父亲的命。”曾广华老人的儿子曾昭梁回忆着父亲告诉他的往事。夹金山山路崎岖狭窄，常年积雪，最浅地方的雪也能没过膝盖，刺骨的寒风吹得人浑身发抖，山上不时会有碗大的冰块夹杂着泥土滚落。一路上，不断有战友陷入积雪中，

同伴伸手施救也跟着陷进去；有的战友想稍作休息，一坐下去就再也无法起来……再悲痛再疲惫，也不悲观不停步，曾广华靠身上的羊皮袄，最终翻越了雪山。

长征结束后，曾广华留在延安，参加过南泥湾开荒，之后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1950年，从军18年的曾广华复员回到家乡于都。“以我父亲的经历，当时复员是可以要求安置工作的，但是他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身上又有伤病，于是主动提出回老家务农。”曾昭梁拿出了曾广华当年填报的复员军人登记表——在“本人对今后工作意见”一栏中，写着“复员回家种田”。曾昭梁说：“回乡后的父亲就是个最普通的庄稼汉，虽然文化程度不高，甚至连自己的故事也经常讲不好，但他明事理，常常教育我们不贪心、严律己。”

1992年10月，老红军曾广华走完了他平凡而又辉煌的一生。羊皮袄、复员军人登记表、复员军人证明书、革命伤残军人证，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一只珍贵的小摇篮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收藏着一只小藤篮。长31.7厘米，宽9.5厘米，高18厘米，系藤编织而成，呈长条形，有底无盖。篮子提手底部已脱离篮筐，篮子多处断裂、虫蛀，篮底霉烂严重，已形成两个大窟窿。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红军后方医院医务人员用来育婴的摇篮，是革命的摇篮，原本有5只。它的背后，有着一段感人的往事。

那是1934年的夏天，国民党军队眼看就要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形势严峻、战斗激烈，前线红军的伤病员大批地向设在于都县新坡乡车脑村的红军后方医院转来。当时，医院就设在村里一处宗祠的大厅，医疗条件相当差。

一天傍晚，护士二组组长宁蓝安顿好几个新进的伤病员后，又毅然接下了院长安排的特别任务——照顾婴儿，“这些都是英雄的孩子，要好好照顾他们。”看着5个睡梦中的婴儿，最大的10个多月，最

小的刚出生几天，宁蓝和同组的姐妹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护士二组共5个人，原本就承担了四五十个伤病员的护理工作，每天都要量体温、打针、上药、抢救、外出找药配药……现在，又多了几个婴儿，护士二组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为了照顾好孩子，姐妹们当起了“妈妈”。

夜深了，医院渐渐安静下来。宁蓝做好最后一遍医护检查后，又像往常一样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刘阿婆家走去。只是这次，背上多了个孩子。村里的刘阿婆孤苦伶仃，几年前儿媳因难产离开了人世，前些日子又把儿子送去参加了红军。知道老人体弱多病、无依无靠，宁蓝每天安顿好伤员后都会“撑”着眼皮子，到刘阿婆家帮忙做一些家务。

“又要照顾病人，又要照顾孩子，可累着你们了，以后就别来照顾我这个老婆子了。”刘阿婆心疼地看着宁蓝：“孩子就放我这儿吧，我来帮着照顾。”“阿婆，我不累，您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孩子除了我带的这个，还有4个呢。”宁蓝把刘阿婆的房间打扫干净后，又安抚她睡下。

第二天傍晚，宁蓝在医院里看见了刘阿婆。因脚腿肿起了一个大包，刘阿婆被乡亲送到医院，来的时候还带来了5个小竹篮。原来，刘阿婆知道医院来了5个英雄的后代，一早便拄着棍子上山扯藤编篮子，不小心从半山腰跌了下来，摔伤了。

“把孩子放篮子里，躺着舒服，你们也安心。”刘阿婆呵呵地笑着：“不用管我，我老了，照顾好孩子们。”上完药后，阿婆在几个乡亲的搀扶下，拖着伤腿回了家。看着阿婆远去的背影，宁蓝的眼睛湿润了。在乡亲的帮助下，5个篮子都用粗绳子拴着，稳稳当地挂在病房的角落。这样，孩子们就有了自己的“婴儿床”。打针、上药、喂饭……护士们在照顾伤病员的同时，又能照看到房内的婴儿。

两个月后，后方医院随着中央红军的大部队转移，摇篮和摇篮里的孩子们曾先后辗转到了于都县的

银坑、宽田等地……

一口带枪眼的行军锅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品中，一口锅格外显眼，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锅是铜质，圆形，敞口，平底，口沿处铸有两个铜环拉手。

“这是一口行军锅，还带有枪眼呢。”讲解员话音刚落，参观者个个睁大眼睛，好奇万分。接着，行军锅的故事把我们带回了那段峥嵘岁月。

时间追溯到1935年元宵节后的一天。一大早，驻扎在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的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把房东钟伦扬叫了起来，说部队要奔赴新的战场了，临走前要把一口行军锅送给他：“老钟，我们这次行军要轻装上阵，这几天给你们家添了不少麻烦，这口锅就当是红军的一份礼物送给你们了。”推让再三，钟伦扬最终收下了这口行军锅。没想到红军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进了村，把全村的老表赶到晒谷场上集中训话，命令大家主动交出红军的伤病员和物品，否则一旦查出格杀勿论。见老表都不吭声，国民党兵决定挨家挨户进行搜查。为了不让这口红军锅落入敌手，钟伦扬偷溜回家，从灶台上取下还热着的锅，背上它就往屋后的大山跑。

“站住，站住，再跑就开枪了！”国民党兵发现有人往后山跑，举枪就朝钟伦扬开了一枪。只听“当”的一声，子弹打在锅上，钟伦扬应声倒地，国民党兵以为他被打死了，便没再追上来。然而，子弹穿过锅并没有击中钟伦扬的要害，他只受了点轻伤。

国民党军撤离后，钟伦扬把被枪打了一个洞的锅背回家，由于无法再使用，他便把这口锅保存起来做纪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钟伦扬去世了，他的儿子钟正予把这口锅交给了于都县博物馆。为了一口红军锅，于都人民不惜牺牲生命。难怪当年周恩来总理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摘自2019年6月2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创办陕北公学。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是我们党根据抗战形势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陕公的办学时间很短，但毛泽东为其办学和发展给予了极大关心和支持，先后十多次到陕公讲话，其中“两件礼物”的故事就是源自他在陕公的第六次讲话。

1938年4月1日，陕公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参加典礼并发表讲话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今天的开学是很高兴的，因此，我很光荣地代表中国共产党欢迎各位同志。像那天我说过，你们不为升官发财，而且，准备着或者正在准备着牺牲生命参加抗战。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我想是由于你们对共产党的信仰，如果不是中共中央在这里，你们不会来的。

面对学员，毛泽东讲道：今天陕公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我的礼物就是这两件，好不好，你们再想一想。我想是有用的，只要我们有一个一致的政治方向，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而且坚持这一方向 and 作风，就可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历史和事实证明，毛泽东送给陕公的两件“礼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两件法宝。今天，我们要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两件“礼物”仍是鞭策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奋斗者的法宝。

（摘自2019年6月4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两件“礼物”》）

□ 席军良

毛泽东送给陕北公学的两件『礼物』



邓中夏表白“初心”的演讲

□ 贺全国

邓中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革命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创造了一系列永载史册的光辉业绩。他不忘初心、献身革命，用39年的生命诠释了自己的初心故事。

1919年8月15日，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邓家湾村的亮公祠人头攒动。全村的父老围坐一团，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站在一旁，正在激情演讲。这时候，一位中年男人站起来问：“隆顺伢子，你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们都听不懂。我就问你，将来北大毕业后怎样报答你的奶奶、爸爸和在座的乡亲们？”

名叫隆顺的，就是正在演讲的年轻人。

他想了一会儿，缓缓答道：“我要做人民公仆，绝不当官。我要联合社会各界同志，努力奋斗和创造，做到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都能过富裕的日子。我的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绝不个人自私自利，单独发财。”

这个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不发大财的年轻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邓中夏。邓中夏原名邓隆勃，乳名隆顺，字仲澥，出生于1894年，1933年9月21日牺牲在南京雨花台。1919年时的邓中夏，风华正茂。这次演讲是他第一次向家乡人民宣告自己的人生信仰和奋斗目标。

（摘自2019年第2期《湘潮》，原标题为《邓中夏：用生命诠释初心》）



长征，是超越时空的丰碑。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中，活跃着一支以“儿童军”著称的队伍——红二十五军，这是长征中最年轻、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队伍。

“儿童军”实施战略转移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有着两支红二十五军。原红二十五军主力在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由“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士的子弟”，于1932年11月重建部队。在这支新组建的队伍中，“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虽是年岁较大的领导，也不过34岁，韩先楚、陈先瑞、刘震、刘华清等都在20岁上下。这是一支以“儿童军”著称的队伍，也是一支年青而富有朝气、充满青春活力而又革命意志坚定的队伍。在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红二十五军以英勇善战成为威震鄂豫皖边区的一支强师劲旅。

鄂豫皖根据地处在敌人长期反革命军事“围剿”下，被敌人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两大块，红二十五军处境日趋艰难。为打破敌人的分割包围，1934年11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红二十五军以中国

“儿童军”：长征到达陕北第一军

□ 卓爱平 刘亚岚

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实施战略转移，成为各路长征队伍中的一支。

“儿童军”进军陕南

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路后，蒋介石乘其孤军远征之际，调集第47师、第54师和第115师组成追剿队跟踪追击，企图以30多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消灭红二十五军。为摆脱敌人重兵追击，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以最快的速度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胜利地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实现了战略转移时的既定方针——进入桐柏山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遗憾的是，部队进入桐柏山区后，却发现桐柏山的地理条件对创建根据地十分不利：紧靠平汉线、襄樊线及汉水，红军能够获得的回旋余地十分狭小；此外，当地的群众基础、物质条件相对薄弱，加上敌人重兵压境，这样的生存环境，可以预料部队将难以在桐柏山区获得发展。据此，红二十五军果断放弃在桐柏山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转而进军伏牛山区。兵贵神速。为甩掉尾随的敌人，实现进军伏牛山的战略方针，红二十五军掉头向东，挥师北上。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急令第40军第44师在老

河口（今光化）、南阳、方城一线迎头截击。

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与敌40军1个旅及骑兵团在方城的独树镇发生遭遇战。这一仗，由于红二十五军暴露在地形平坦的不利环境下，处境十分危险。为打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儿童军”不畏强敌，英勇拼搏，终于挫败国民党军的合击，顺利进入伏牛山区。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如同桐柏山区存在诸多不宜创建根据地的因素，伏牛山区也存在人烟稀少、地域狭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匮乏等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因素。如果部队留在伏牛山，可以预料，下一步将难以获得大发展。红二十五军再度变更战略方针，决定西进，从伏牛山入陕南，相机开辟新的根据地。

从伏牛山入陕，朱阳关、五里川两个隘口是入陕之路。敌人在隘口重兵布防，控制入陕大道。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在当地向导带领下沿着深山峡谷隐蔽前进，绕过敌人防线，打破了20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于1934年12月9日翻越蟒岭，进入陕西洛南县。“儿童军”从此“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走上了宽阔的发展道路”，进入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新阶段。

在开辟鄂豫陕根据地期间，红二

十五军克服了长途跋涉、连续作战以及人地生疏、给养不济等重重困难，相继打破了敌人第一、二次“围剿”，粉碎了敌人企图在3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阴谋，在鄂豫陕站稳了脚跟。

“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

红二十五军自1934年冬奉中央指示实行战略转移，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对主力红军的消息更是一无所知。直到1935年7月13日，在粉碎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后，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行动；并了解到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界集结，妄图围堵消灭红军主力于川西地区。随即，红二十五军获取的这些消息在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送达的中央文件中得到确认。

鄂豫皖省委审时度势，于1935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作出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与陕北红26、27军会合，以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在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能

够通观全局，作出这一战略决策，不仅适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实现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同时也与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相吻合。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踏上了西征北上的行程。红二十五军西出秦岭、北渡渭河，以20多天的急行军直抵静宁城下，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切断。西兰公路被切断以后，红二十五军紧紧扭住西兰公路不放，在西兰公路以北地区艰苦转战10多天，由于一时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消息，红二十五军决定先行北上策应主力。当“儿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城下时，这些在敌人眼里不过是“地上跑的小兔子”，却却自以为是“天上飞的老鹰”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直捣敌人后方的红二十五军，在钳制了敌人，减轻了红一、四方面军的压力后，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尽管沿途人烟稀少，部队无粮可筹，饥疲不堪，但在严重的饥饿死神威胁面前，全军上下没有一个人退却。

“儿童军”以打不烂、摧不垮的钢铁意志西征北上，前出陕南陇东两个

月，行程4000余里，沿途攻克了3座县城，进行了大小战斗10多次，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且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正如1936年底出版的《共产国际》第7卷第3期刊载的《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所评价的：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俱寒”。

9月9日，红二十五军抵达保安宁山，取得北上入陕的伟大胜利。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红26军、27军胜利会师。这一会师，既是西北主力红军大会师的前奏，也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来到陕甘洛河川，劳动百姓好喜欢。”一曲信天游，由衷地唱出了陕北人民喜迎劳苦远征的红二十五军的兴奋之情，也宣告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胜利落下帷幕。

以“儿童军”著称的红二十五军，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表现出的披荆斩棘、不畏艰难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召着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高度评价“儿童军”用热血和青春谱写的壮丽诗篇。193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在《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军、26军全体指战员书》中高度评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指出：“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英勇斗争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斗争的称赞。”《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也盛赞：“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摘自2008年第10期《党史博采》）